

关于对外宣传和外事工作的一组批语〔1〕

关于对外宣传和外事工作的一组批语〔1〕

（一九六七年三月——一九七一年三月）

一九六七年以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对外宣传工作和外事工作有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批示。毛主席的批示，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坚决贯彻。现将毛主席在中央办公厅、军委办事组、中联部和外交部等文电上的一部分重要批示和修改，汇总于后。

（一）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毛主席对澳共推荐来中国的大卫·库普反映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题为《让我们“治病救人”》的一张大字报的批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总理阅后，送文革小组一阅。”

大卫·库普在这张大字报里分析了西安当时出现的两派对立，由群众大会开除党员党籍，打、砸、抢，游街等一系列情况，认为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并受坏分子的操纵。他提出，“要把那些存心要把我们引上背离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人清除出去，然后我们才能搞造反派、革命干部和解放军的三结合”。

（二）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毛主席在《桑穆加塔桑就发表主席内部谈话问题的一封信》〔2〕上批示：“康生同志：这类事，不要去责备发表的同志。”“一般谈话，公布也不要紧。”桑穆加塔桑在这封信中说：“现在，有人告诉我，（同主席）谈话的内容未经同意不得公布。”

（三）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对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宾简报《安斋等人认为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3〕的批示：“康生同志：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你的看法如何，望告。”

（四）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姚文元〔4〕同志转达了毛主席对安斋等同志关于日本革命道路问题的意见的批示。

姚文元同志说：首先我向同志们（安斋库治等同志）转告一个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我向安斋库治等同志问候；毛主席看到了日本同志对日本要不要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意见，其中提到了对一九三八年毛主席《战争和战略问题》的一段论述是否有效的问题。毛主席对此有一个批示。我在这里把毛主席批示的原文念一下。毛主席说：“我认为安斋等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在一九三八年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的论述，仍然有效。”这就是指的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所写的那篇著名文章《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所论述的问题。这篇文章的第一节第一段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毛主席在第一节第二段中完整地、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总结了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武装起义的经验。在那一段的最后有这样的话：

“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

村，而不是与此相反。”毛主席所说的：“我在一九三八年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的论述，仍然有效。”

就是指这篇文章中的整个这一段话。

（五）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毛主席在一个拟在援外飞机喷漆毛主席语录的请示报告〔5〕上批示：“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

（六）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毛主席对关于开好一九六八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6〕，作了重要批改。在“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当做首要任务”之后，增加了“但应注意，不要强加于人”一句。

（七）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毛主席删去了我援外某工程移交问题的请示报告中的一段话：“举行移交仪式时，应大力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说明我援×修建××××工程的成绩〔7〕，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主义教导的结果，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并批示：“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

（八）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七日，毛主席在关于答复新共威尔科克斯同志对我对外宣传工作的批评的请示报告〔8〕上批示：“此事我已说了多次。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

（九）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对中共中央联络部

起草的致缅甸共产党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贺电，作了重要修改和批示〔9〕。毛主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缅甸情况相结合的伟大胜利”，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也具有伟大的意义”，改为“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某一方面也将具有一定的意义”。

（十）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在发表缅共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声明的请示报告〔10〕（涉及在我报刊上发表兄弟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上批示：“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

（十一）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毛主席在中央联络部、总参谋部起草的关于帮助外国人员进行训练的文件中，将“主要是宣传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句中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二十一字删掉，并批示：“这些空话，以后不要再用。”

（十二）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毛主席批评了在一个文件〔11〕中用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种提法。毛主席再一次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

（十三）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对外交部关于加

强宣传主席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作了重要批示：“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12〕

（十四）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一个接待外宾的计划中，曾经规定过群众在同外宾接触时可“自发地分别地赠送毛主席像章”。毛主席批示：“不要”。

（十五）一九六八年七八月间，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起草的关于处理某兄弟党要求发表它的一篇文章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删去了几个字”。报告中两处提到希望该党“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

解决党内分歧，毛主席都把“毛泽东思想”这几个字删去了。

（十六）一九六八年八月，毛主席在军委办事组《关于更改援外军事专家名称》的报告和电报稿上批示：“名称问题关系不大，可从缓议。”“资产阶级传下来东西很多，例如共和国、工程师等等不胜枚举，不能都改。”“此件缓发。”〔13〕

（十七）一九六八年九月，毛主席在《人民日报》社论初稿（世界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14〕上的批示：“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

社论的有关段落如下（毛主席删掉的地方，用[]括住；增加的地方，{}括住）：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毛泽东主席给日本工人朋友赠了亲笔题词：“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今天是这一光辉题词的六周年纪念，本报在头版位置上发表了毛主席题词的手迹。毛主席的这个题词，不仅对于日本人民的革命事业，而且对于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一旦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能够产生无穷无尽智慧和力量，去推动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各国人民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最根本的保证。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反复地教导我们：“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

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实践相结合，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

毛泽东同志把理论和实践相联系这件事，生动地比作为“有的放矢”。毛泽东同志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及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继续进行革命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问题，从而把中国革命从胜利引向胜利。[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伟大的典范。]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条原则适用于中国革命，也适用于日本和一切国家的革命。

这就是说，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一方面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时，必须从实际生活出发，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独立地制定和实行符合本国情况的政策和策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借口什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那是十足的机会主义，即现代修正主义！

日共官本〔15〕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借口日本“国内外条件”不同，标榜什么“独立自主”，其实都是鬼话。他们在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他们所起劲地攻击和反对的，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竭力歪曲和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疯狂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他们]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武装夺取政权，鼓吹所谓“和平革命”，推行所谓“议会道路”。实际上就是不要革命，背叛革命，反

对革命。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可耻叛徒，是日本革命事业的可耻叛徒。

今天，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在蓬勃兴起。[毛泽东思想在日本得到日益广泛的传播]。日本人民的革命觉悟不断提高，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左派队伍正在日益成长壮大。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人民，大造宫本修正主义集团的反，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他们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武器。日本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派认识到，摆在自己面前的一个光荣而严肃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认真地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具体运用到日本人民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从日本的具体情况出发，解决日本革命的一系列战略和策略问题，把日本革命不断地推向前进。日本革命取得胜利的过程，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紧密地相结合的过程。

我们相信，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日本真正的革命党，一定会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诞生。它将领导日本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经过长期曲折的斗争，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赢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我们的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正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世界各地广泛地传播。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世界各国人民必将朝

着胜利的航向，继续奋勇前进！]

（十八）一九六八年九月，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起草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送审稿）》的批示：“去掉第11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16〕送审稿的第11条是：“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

（十九）一九六八年九月，外交部《关于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访华接待计划的请示》原文中有“通过安排参观访问，突出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以及工农业生产的大好形势”。毛主席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一句删掉了，并批示：“对这些不应如此做”。

原文附的《欢迎（送）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的标语口号》十九条，毛主席批注：“去掉三条”（即：17、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18、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19、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二十）一九六九年一月，毛主席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走投无路的自供状——评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和苏修叛徒集团的无耻捧场》〔17〕上批示：“照发。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18〕。”

（二十一）一九六九年五月，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五月二十四日声明稿〔19〕上批示：“可用。略有修改。”

毛主席在声明稿的“中国政府建议，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日期”一句中的“日期”之后加了“和地点”三字。并在“如果苏联政府认为中国政府的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态度是软弱可欺，可以用核讹诈政策吓倒中国人民，用战争实现对中国的领土要求，那就完全打错了算盘。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七亿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一段中，将“不是好惹的”改为“是不好欺负的”，还加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句。

（二十二）一九六九年六月，毛主席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20〕，批示：“可发”。

毛主席在社论的第二段“二十年来，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伟大胜利，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句中的“繁荣昌盛”前边加了“有了初步”四个字，将“强国”改为“国家”。毛主席并批示：“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情况的自己吹擂。”

（二十三）某拉丁美洲共产党总书记等人，从一九六九年三月至十二月间，先后给我党中央和林彪〔21〕同志四次来信，承认过去追随苏修反华是错误的，要求同我“恢复两党关系”。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二日，毛主席在中联部抄印来信的文件上批示：“林彪同志：这些信看来似无恶意。他们被人抛弃，想寻出路。请转康生同志考虑是否可以同他们联系。”

（二十四）一九六九年九月，毛主席对外交部《关于给日中友协（正统）各地组织庆祝我国庆集会发感谢支持电》中的“二十年来，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特别是在三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句中的“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为“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二十五）一九七〇年六月三日，中国红十字会《关于救济秘鲁地震的请示》，拟以该会名义慰问并捐给秘鲁红十字会现款人民币五万元。

一九七〇年六月七日，毛主席口头指示，给秘鲁救济五万元人民币太少。给罗马尼亚救济了一百万元，秘鲁比罗马尼亚死人多，可否给秘鲁救济一百万或一百五十万元人民币？请总理酌定。

（二十六）一九七〇年六月，外交部在“关于我救济匈牙利遭水灾地区居民的请示”中，建议我红十字会捐现款十五万元人民币。毛主席批示：“似太少，可赠五十万元，等于赠罗之一半。”

（二十七）一九七〇年九月，毛主席在中联部起草的我党中央致朝鲜劳动党成立二十五周年贺电稿上，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中国人民”里的“毛泽东思想”五个字圈去。

（二十八）一九七〇年十月，毛主席在外交部起草的给日本社会党成田知巳〔22〕的复信稿上，作了修改。原复信稿中说，“社会党朋友更应继承和发扬浅沼〔23〕精神，为反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伙伴、走狗、帮凶而进行斗争。如先生同意这一意见，我们欢迎日本社会党代表团于十月中旬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毛主席将“社会党朋友更应继承和发扬”中的“更应”两字圈掉了，将“如先生同意这一意见，我们欢迎……”改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欢迎……”。

（二十九）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外交部在《关于对越南南方五省受灾的慰问和赠款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建议以中国红十字会名义向越南南方解放红十字会捐赠价值二百万人民币的物资。毛主席批示：“宜增至五百万。”

（三十）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六日，毛主席在中联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批示：“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

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24〕

（三十一）一九七一年二月，旅游局在《关于一九七一年接待外国人来华旅行的请示报告》中说，一九七一年拟接收外国人来华旅行八百至一千人，对象以左派和对我友好的工农、学生、教职员为主，上层友好人士有计划、有选择地少量接收。毛主席批示：“人数可略增加。右派也可来一点。”

（三十二）一九七一年二月，外交部办公厅编印的《外交活动简报》第二十九期《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外地的几点反映》的第四条中称，加西亚在井冈山参观时，对讲解员不提南昌起义和朱德同志上井冈山这两段历史提出意见说：这两段历史应该提，不提中国人容易理解，外国人就不容易理解。提这两段历史事实不仅不会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相反人们会通过对于当时的各种错误路线的了解，更加体会到毛主席路线的正确。对此，毛主席批示：

“第（四）条提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

（三十三）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周总理给毛主席的报告中说，我乒乓球队拟仍前往日本名古屋参加三十一届国际乒乓球比赛。到日本后支持柬民族团结政府不承认朗诺〔25〕集团的球队为合法，并主张驱逐，对南越卖国集团派的球队，亦采取同一态度，对以色列也询问阿联、叙利亚的态度。如不成，就避开与他们比赛。我球队如去，当作好各种警戒准备。〔26〕毛主席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文件

刊印。

注 释

〔1〕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本篇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六月八日印发的会议文件之六。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曾将本篇（五）至（十）、（十三）、（十四）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并在通知中指出：“最近几个月，毛主席对对外宣传工作，作了极为重要而严肃的批示。现将毛主席的多次批示，印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党、政、军、群革命领导干部和外事工作干部中进行传达。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正确理解，坚决执行。一定要以毛主席的指示为武器，检查对外宣传工作，肯定成绩，纠正缺点，总结经验，提出改进的具体措施和办法。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对外宣传工作，做得更广泛深入，更切合实际，更科学，更有效。”

〔2〕 指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给在中国广播事业局工作的美国专家李敦白的信。信中就他在中国访问后回国时在机场谈话和回国后发表的文章中透露了同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表示歉意。信中说，这“完全不是故意的”。“如果你能够找个时间去会见康生同志或刘宁一同志，准确地解释一下产生这个错误的情况，我不胜感激”。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宁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代部长。

〔3〕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印的这份简报说，日本左派理论刊物《革命战士》编辑安斋库治等三人在学习“人民战争”问题时，发表了如下一些观点：

（一）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战争和战略问题》第一节中，曾经谈到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以及这些国家的武装斗争问题。如果说像日本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应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那就是说毛主席这段话过时了，要加以修正。对于中国道路的普遍意义，应以毛主席的这段话作基础来理解，即这里所说的普遍意义，不包括日本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

（二）在工人阶级占优势的国家里，应首先重视工人阶级的作用。

（三）在日本，城市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农村不是薄弱环节。

（四）目前在日本是进行武装斗争的教育和组织准备阶段，不是实行武装斗争的阶段，也不是进行武装起义的时机。

（五）我们不了解为什么从中国回日本的同志，都说日本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一些同志关于要日本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种种暗示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六）过分强调中国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的全世界普遍意义，实际上就是否定十月革命从城市到农村的道路。不能说十月革命道路只有特殊意义。

〔4〕 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5〕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三日关于援越问题给总参谋部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鉴于援越飞机要在我国使用一段时间，建议和我空军使用的飞机一样，喷上毛主席语录和在座舱内镶上毛主席像章。改装训练结束后，原样移交给越方。

〔6〕 指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开好一九六八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稿。

〔7〕 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七二年六月八日印发的文件中原文如此。

〔8〕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康生、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组员姚文元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六日给毛泽东的这个报告说，一九六七年三月，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来访时，对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提出批评，认为我们的对外英语宣传，内容很好，但所采用的语言和形式，与英语国家的群众格格不入，易引起反感。主要原因是没有调查研究宣传对象，报道的事实和背景没有交待清楚，文字冗长累赘，形容词太多，译文质量差，外国人不易理解和接受。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他又委托访华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转达对我国对外宣传工作的意见，甚至说“中国同志应很好注意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希尔是反对威尔科克斯的意见的。他认为，威尔科克斯提出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而不仅是宣传形式问题。问题的中心是对毛主席在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的作用作何评价。他认为，为了宣传毛主席把马列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就不能不十分强烈地、始终一贯地、反复地进行宣传，这样做对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对西方世界，是非常必需的。康生等在报告中说，对他们的意见，我们主要答复了三点：

- 一、愿意倾听兄弟党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
- 二、对毛泽东思想的估价，我们是非常克制的，不但不是大国沙文主义，而且克制得过分了，群众有不少意见。在对毛泽东思想

的估价和宣传上，我们完全同意希尔的意见。

三、在宣传形式和语言方面，我们的工作是在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的。改进对外宣传工作，需有一个时间和过程。

〔9〕 毛泽东对这个贺电稿的批示全文是：“有修改。请注意：以后不要在任何对外文件和文章中提出所谓毛泽东思想，作自我吹嘘，强加于人。毛泽东一九六八年三月廿七日”

〔10〕 康生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给毛泽东的这个请示报告中说，缅甸共产党的声明，要求我们在《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不便给他们改，他们也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这是兄弟党中央的文件，他们在国内都讲毛泽东思想，如果要求他们改，可能发生误会，不登也不好，请主席指示，是否可以登载。这个声明后来照原文发表在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上。毛泽东对康生这个请示报告的批语，除本篇（十）中所引用的一段外，在文中“一般地说”

之前，还有一句：“这些材料，请你们酌定，我不看了。”

〔1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工业军管小组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四日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七机部某办公室“正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召开415会议”，到会的大部分同志来自祖国各地，他们恳切请求毛主席接见。毛泽东审阅时，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下面划了两道杠，并写了这个批语。这个批语除本篇（十二）中所引用的一句外，紧接着还有一句：“此事请康老在碰头会上提出并讨论一下措施。”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重要通知》。通知指出：“毛主席的批评，应引起各级党、政、军、群及驻外使馆的注意。”“今后，不论在报刊上（包括各种小

报），在内部文件中，在各种讲话中，特别在接待外宾时，一律不要再用‘世界革命的中心’的这种说法。对于‘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应经常警惕和批判。”

〔12〕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六月八日在转发毛泽东这个批语的指示中指出：“外国人关于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国际革命运动的影响的材料，可由新华社刊登在内部《参考资料》上。”

〔13〕 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一九六八年七月八日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写报告说，我援外军事人员现在仍称“军事专家”，“军事专家”是资本主义社会对资产阶级“军事学术权威”的称呼，与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我军援外人员身分不相称。我们建议，将“军事专家组”

改称“军事工作组”，其人员按行政职务和工作性质，分别称组长、教员和翻译。如有“首席专家”，则改称工作组组长，下辖各军事工作小组。本篇（十六）中的第一个批语写在这个报告上。八月六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再次给毛泽东等写报告，建议将“军事专家组”改称“军事组”。本篇（十六）中第三个批语写在军委办事组八月六日的报告上。本篇（十六）中第二个批语写在八月六日报告的信封上，在这个信封上，毛泽东还写有“林副主席、总理再阅”一句。

〔14〕 这篇社论稿经毛泽东修改后，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

〔15〕 宫本，即宫本显治，当时任日本共产党总书记。

〔16〕 周恩来等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五日送审的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名义下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共三十条，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第十一条，并写了这个批语。九月二十六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说：“主席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的批示，已经在中央文革碰头会各同志中传阅了”。“现在的办法，第一是遵照主席的指示去掉这个口号，即将中央通知发出。第二是可否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这个通知而仍保留第11条，以适应和配合这次国庆的宣传”。毛泽东审阅这封信时，又批示：“去掉11条为好”。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向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发出的通知中，标语口号共二十九条，删去了送审稿中的第十一条。

〔17〕 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尼克松，当时任美国总统。

〔18〕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以《一篇绝妙的反面教材，美帝新头目尼克松的“就职演说”》为题，全文登载了尼克松一月二十日的就职演说。

〔19〕 周恩来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九日送毛泽东等审阅的这个声明稿，是为答复苏联政府三月二十九日声明的。内容共分六个部分：

一、珍宝岛是中国的领土，珍宝岛事件是苏联政府蓄意挑起的。二、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都是沙俄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

的不平等条约。三、中苏之间存在边界问题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四、苏联政府破坏边界现状，挑起边境冲突。五、到处扩张领土的是苏联政府。六、中国政府主张和平谈判，反对诉诸武力。这个声明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20〕 这篇社论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

〔2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22〕 成田知己，当时任日本社会党委员长。

〔23〕 浅沼，即浅沼稻次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〇年任日本社会党书记长。一九五九年三月，率社会党友好使节团访华，在北京政协礼堂发表演讲，提出“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引起日本各界极大反响。一九六〇年三月任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同年十月十二日在东京日比谷公堂召开的三党党首讲演会上讲演时，被刺身亡。

〔24〕 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曾将这个批语作为《毛主席、林副主席最近批示的八个重要文件》之三印发，一九九四年编入《毛泽东外交文选》。

〔25〕 朗诺，当时任“高棉共和国”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武装部队四星上将总司令。

〔26〕 周恩来的报告中还说到，日本群众得知中国乒乓球队拟参赛后，热烈欢迎，左派组织了五百多人保护我球队，但

右派也派人到名古屋企图挑衅，日本政府极为头痛，已派大批警察护卫我队预先分住的旅馆。这将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中国乒乓球队后来参加了这届世乒赛，并获得男子团体冠军、女子团体亚军。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